

韩剧《再次我的人生》是今年上映的一部重生剧。如此的重生桥段在网文和网剧中并不少见,且在数不胜数的重生题材网文中,该剧的剧情也略显简单和俗套。

一个刚正不阿的检察官要扳倒在总统面前都拥有话语权的国会议员,一强一弱的明显对比,是该剧稍可期待的一方面,但通过影视剧特别是韩剧的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估量该剧的价值不能单纯依靠剧情分析,而应从结构和叙事逻辑上思考其意义,进而产生对重生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理解。

概念意义上的重生,是指重新再活一次,即再经历一次人生。与穿越的概念有所不同,重生意味着生命的重新诞生,并没有携带原有的经验。穿越不光是指空间和时间上的往前或者往后,而且还附带主角自身已经拥有的经验。《再次我的人生》中,主角在经历死亡的结果前经历重生,是结合了穿越的重生,既发生了空间、时间的位移,也带回了过往的记忆。这样的重生,无疑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因为如此便有了可以修正过去的不足,创造新的历史的可能。但值得警惕的是,创造新的必然要波及旧的,新旧之间的碰撞会造成不可掌控的连锁反应,正如片中提到的蝴蝶效应。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将存在与时间拉开了一条有限的直线,让人们不得不思考生与死、存在与非存在、短暂与永恒、现实与理想等等问题。而如果我们跳出哲学家的思维,打破线性存在,即是推动该剧剧情的底层逻辑,也构成了网文中所谓的爽点和该剧的看点。古诗所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可谓异曲同工,昭示出生命的单向性与在此期间人们能够延展生命宽度的诸多可能。

该剧给了我们另外的启示:是不是没有遗憾的人生即为圆满? 检察官金熙宇利用过往积累的经验,将原本需要考三次才能实现的大学梦缩短为一次,也因之前做检察官掌握的线索成功掌控了党阀赵泰燮身边的一众走卒,但仍然有不少地方英雄气短,过往经验无法直接取用,毕竟不符合正常逻辑,而因改变命运所造成的连锁效应也往往无法预计。汪曾祺在《我们都是世间小女儿》一书中说:“难忘山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还那一邂逅之后的欠缺,那一股离别之意。”莫言在《檀香刑》中也说:“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欠;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通过观察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在叙事方面并没有迥异的不同,或许这也是电影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跨界的特质。但从电影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却因为地域差别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貌。单从该剧来看,政治题材的电影在韩国或者欧美国家更多地出现,原因是党派为财阀所掌控的历史渊源,让这种揭露和呈现有更多视角上的选择。在文化方面,韩国影视作品中的长幼、上下级之间的尊卑秩序更为严格,其反映出来的文化的扶持和养成应从小抓起,也给我们以启示与警醒。

在该剧中,检察官金熙宇一出场便经历了被党阀终结人生的悲惨命运,而阴间使者的出现,给了他第二次人生选择。他挽救了父母和拍卖之王吴容洙的生命,拯救了因家庭变故滑向深渊的金圭丽和杜尚万,协助遭到排挤被发配的正直检察官金石圭做上了检察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无法掌控杜尚万被害,金韩美私生女身份暴露等因为人生改变后发生的时光扭曲。

重生是一把双刃剑,让重生之人既体验到了提前预知并采取措施干预结果,从而避免灾祸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必须自我消化因改变而产生的副作用。一旦双向的思维逻辑得到现实的印证,依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操控。诚如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所描述的死亡:“很奇怪,只要够疲倦,原来这么容易就能走到这一步。”这种疲倦,也许当我们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连接之后便一直存在:我们有了独立的意识,有了对有限性的觉醒,便意味着一生都会面临着短暂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的激烈冲突。无可辩驳的是,纵然拥有再度选择的能力,纵然能够利用种种便利规避种种风险,在抵达目标的道路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无力感。这就是人生。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人生能重来你会如何选择? 是继续原来的人生还是换一种活法? 我想,换一种活法的选择应该会远大于继续原来的人生。再放大一下问题,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多次你会如何选择? 这更是一个有意思的导向。按常理来看,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永远都无法实现无限的可能,而如果以无限的生命来定位,那么无限的可能也将变得有限。这是一组无法对等的命题,也是《再次我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应该始终相信,在我们不断地追问中,每个人都能找到灵魂暂时的安放,可能在人生的终点,或许也是新的起点。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如果人生能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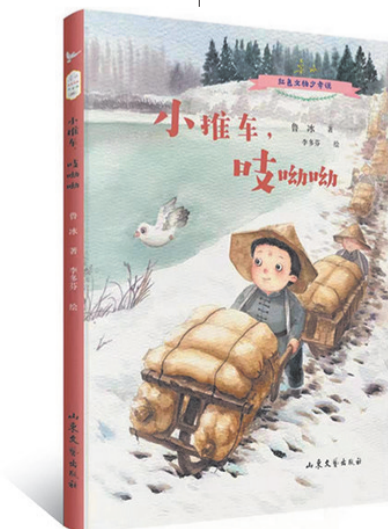
——解构《再次我的人生》所呈现的思考

◇ 王国梁

于无声处听惊雷

——浅析鲁冰新作《小推车,吱呦呦》

◇ 李志越



拿到鲁冰老师的新作《小推车,吱呦呦》,一口气读下来,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以童话的形式讲述真实的历史,伴随小推车寻找家园的一路,也是走进沂蒙革命老区触摸红色民族脊梁的一路。

这本书有着鲜明的红色主题。在血与火、爱与恨中化为金币的假银元;姻缘在水乳交融中化为沂蒙红和沂蒙颂的莲子;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获得了生命的百灵鸟;跟随淮海战役中的支前车队,感受着真情感受着爱,最终化为绿树的树枝,四个主要故事内容本身紧紧围绕着战争与和平展开。作者借助小推车、银圆、蓑衣等一件件红色文物串联起“乳汁救伤员”“全民支前”等真实的革命故事,更是在假银元替战士抵挡子弹、积极救助子弟兵的英雄重获歌喉等情节中,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小推车即将回归家园的结尾,又一波三折地安排了跌落悬崖的情节,因此有了象征和平的猎枪感冒这一最终大结局。

在一本主要面向儿童的作品中,以战争与和平作为故事主线,在无形中对小读者起到了教育作用。对少年一代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可以告诫他们不忘先辈浴血奋战之艰辛,珍惜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又能勉励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以少年之强大完成中华崛起之伟业。进入新时代,青少年肩负的使命光荣而艰巨,从赓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的角度而言,《小推车,吱呦呦》的出版恰逢其时。

作为一本童书,《小推车》在叙事中采用了经典的“重复”手法。全书的四个章节、八个故事都是在“你和小雨点一定走累了,就在我身边歇一歇,听我讲一讲我的故事吧”以及“呼——呼——”风儿紧紧地跟随着他们,同时给小推车讲起了小雨点的故事”这两句不断重复的句式讲述出来的。

“重复”这一创作方法很早便出现在文学创作中,《诗经》里有不少作品便是通过不断重复同一诗句来强调内容并达到气势节奏的高昂。用“重复”的方式创作儿童文学更是与小读者的阅读心理不谋而合,以相同的句式引出每个故事,不仅能让小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作品整体框架,更可以激发其好奇心,主动想象下一个要讲述的故事。同时,借助童话这一体裁讲述故事更便于进行价值升华。用真银元换来的假银元历经战场硝烟最后化为一枚金币;绣在头巾上的百灵鸟经受战火洗礼后和哑女一起喊出“战鸽快飞”,从而拥有了真正的生命;一根树枝在支前车队中时刻感受着百姓对前线战士的真情与爱,从而化为一棵绿树。这些融入了童话想象的情节在增强作品阅读性的同时,更带给小读者们深刻的精神洗礼。

此外,作者还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双线结构。在讲述战争残酷与艰难的同时,安排风儿讲述小雨点一家静谧祥和的田园生活:春天给外婆送春饼、初夏参加小动物们的聚会、习习秋风中采摘满园的果实……这些美好的生活图景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节气引出并徐徐展开,辅以大量沂蒙地区的谚语、风俗,在一张一弛间谱写了战争与和平的二重奏,可谓独具匠心。

《小推车》另外一个鲜明特点便是其音乐般的趣味语言。“打了春,脱了瘟,人不知春草知春”“上午立了夏,下午把扇拿”“天亮了,鸡叫了,鸭子挑水来到了。狗上锅,猫烧水,猴子炕上当婆婆”,类似的民间谚语、儿童歌谣在作品中不胜枚举。大量出现的儿歌、童谣使作品读来朗朗上口,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这种语言形式有着本能的喜爱,吟唱的歌谣语言更是比散文语言更容易被接受和记忆。成人作者在写给儿童的作品中往往容易丧失语言立场,或是全然忘记阅读对象,使用晦涩的描述使故事变得生硬无趣;抑或是一味采用想象得过于低幼化的对话,使读者觉得失真从而丧失阅读兴趣。音乐般的语言有着四两拨千斤之巧妙,从这一语言方式的使用中更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深厚积淀。

鲁冰老师曾说:“我写童话的原则也是大繁化为大简,重化为轻……具体到此书,极简的吱呦呦包含万千。”《小推车》独特的语言形式也正是这一写作思路的印证。这本用大量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的歌谣讲述的童话小说,在一声声“吱呦呦”的吟唱中驱动着儿童读者思绪飞扬,使故事画面鲜明地活动了起来。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的成人读者,我读完这本书有一种天然的感动。作为在农村出生、成长的九零后,初夏的黄昏,奶奶在灶前升起炊烟,结束了一天劳作的爷爷讲述过去的故事,是我长久以来极其怀念的童年图景。然而伴随着时间车轮的前行,亲历战争历史的那一代人正在远去,如何向少年讲好过去的事,成为值得儿童文学作家深思的命题。鲁冰老师的这本《小推车,吱呦呦》,为我们掀起了一角答案。

作者简介:李志越,儿童文学专业硕士。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岛」
扫码关注